

总统的 女儿

——里根家事

〔美〕帕蒂·戴维斯

莫林·斯特兰奇·福斯特



新华出版社

H O M E F R O N T

P A T T I D A V I S

with

Maureen Strange Foster

CROWN PUBLISHERS, INC. 1986 NEW YORK

据纽约皇冠出版公司1986年版译出

总统的女儿——里根家事

〔美〕帕蒂·戴维斯 莫林·斯特兰奇·福斯特 著

之 援 首 第 刘 联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出 版 社 发 行

一 二 〇 二 工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插图2张 199,000字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203·085 定价: 2.10元

ISBN 7-5011-0053-5/K·014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美国总统里根之女帕蒂·戴维斯与女作家莫林·斯特兰奇·福斯特合作写的自传体小说。纽约皇冠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原名《家事》（《Home Front》）。

帕蒂·戴维斯今年34岁，真名叫德丽夏·里根，戴维斯是其母南希的女佣的姓。书中年轻的女主人公贝思是一位极有个性的姑娘，自幼便与雄心勃勃的父母对她的教育分庭抗礼，恋爱曲折坎坷，政治态度和生活方式与父母亲充满矛盾。作者自己说，她“希望读者能通过这本书看到某个人充满极不寻常的冲突的生活”。书中还用较多笔墨描绘了里根夫妇鲜为人知的政治、文化和家庭生活。

里根夫妇对帕蒂著书披露他们的家事十分恼火。更使他们不安的是，帕蒂正准备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自饰女主角，并声称还要写一部专门描写政治阴谋的小说。

本译本有少量删节。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89/11/19

前 言

我们被强塞进那辆最为锃光瓦亮的大型高级轿车中，长长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头。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车窗外，总统就职日的首都沉浸在一派狂热之中，同五十年代一部描写飞碟袭击这个城市的影片中展现的景象几乎没什么区别。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交通被堵塞，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警车笛声长鸣，回声不绝于耳。时间飞逝。片刻之后，我的父亲在青灰色的天空下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在白宫，我们被带到楼上，佣人们正等在那里，准备作自我介绍。一些闲不住的人跑出跑进，忙得不亦乐乎。我的父亲立即迷上了起居室，他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环顾四周，似乎在努力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里如今是他的家了。

“总统先生，您有什么指示？”

“先生，车队定于八点钟离开。”

“先生，您的报纸送来了。”

布赖恩蹒跚达达进了起居室，扬起头，从高高的天花板、琥珀色的油画，直到漂亮的地毯，左顾右盼张望了一番。

“爸爸，这就是他们给你的客厅吗？”他用手推了一下墙，似乎那里会裂开，出现一条秘密通道。“陈旧了一点儿。但愿没有

白蚁。”

母亲沉着脸说道：“布赖恩，你整天都是穿着这身讲究衣服，脚蹬牛仔靴吗？”

他低头瞅了瞅。“可不是，要不然摄影记者怎么一直把镜头对准我的脚呢。”

父亲正聚精会神地翻阅一摞报纸，还不时地把手指放到舌头上舔一下。“你瞧，哈丽雅特，我觉得我们今天宣誓时不应该用家里那本旧《圣经》。封皮破烂不堪。依我看，整本书也马上就要散了。”

“好了，书没有散，亲爱的。万事如意。伊丽莎白，你告诉总机你正在等格雷格的电话，让他们一定给你接过来了吗？”

“妈妈，我说过两次了。”

“他什么时候到？”

“今天晚上。”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在各个房间转来转去，查看家具、窗帘和墙壁。

“这里确实历史悠久！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住在这里吧。不过也太不幸了，我居然等不得重新装饰房间。”

我怀着敬畏的心情努力去想象，但除了麻木不仁之外，一无所获。它就象是我将要错误地闯进去的一幕戏剧。凭窗望去，聚集在远处大门外的人群正扒着铁栏杆向里面张望。如果他们知道我觉得自己宛如局外人，觉得尽管他们站在那些铁门外面，但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他们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的话，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我感到处境尴尬，茫然不知所措，但对就职典礼并不觉得突然。因为，我还在玩布娃娃的年月，就已经开始准备迎接这一天了，尽管我的准备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功。

封面设计：王师颖

总统的女儿—— 里根家事

这是里根女儿帕蒂·戴维斯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主人公贝思·坎菲尔德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青年，她向往在安宁和隐秘中建立自己的生活——没有政治干扰的生活。但政治是她作州长的父亲的生命，于是她陷入了一场“越南战争”——家庭战争之中。政治最终使贝思与父母分道扬镳。她开始参加反对越战运动等。这样，贝思不仅变成了一个与父母疏远的女儿，也成了一心想当总统的父亲的政治包袱。也因此，生活迫使她在有名望的双亲和脆弱的自我之间、在自己是谁和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之间作出终生的抉择。

hvac/57/14

当我坐等电话的时候，使今天成为现实的所有陈年往事不禁涌上心头……我想起了一个晚上，那还是在我们家里逐渐为多得没处放的象和垫子塞满之前。象有玻璃的、瓷的和木雕的；垫子上有钩针编织的白宫图案和红色的“勇往直前”的字样。想到这些，我感到从膝间骤然升起一股凉气，一直凉到心窝，积在那儿似乎数年不散。

一九六五年底的那个夜晚，我们被召集到父母亲的卧室，那里是召开家庭会议的地方。当时我家住在加利福尼亚。父亲和母亲坐在壁炉旁的翠蓝色缎面椅里，我坐在床头，围成了适合这种场合的半圆形。布赖恩懒散地趴在地板上，他当时十一岁，对于叫他来这里是因为有比看电视更重要的事，他并不感兴趣。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听着蟋蟀在通往花园的法兰西门外鸣唱。一股暖风吹过烟囱，带来去年冬天炉火的气味。

我的父亲开了腔：“我要大家坐到一起，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觉得胃直发紧，便东张西望，想溜出去。壁炉台上方挂着父亲和我的画像，画这像时我才两岁多。人到底能记得多久以前的事呢？在中学时，一个挨着我拴马的女同学曾告诉我说，她能

记得她在娘肚子里的感觉，还记得自己出生时的情景。有些人说他们能回想起甚至比这还早的事——上一辈子的事。凡是我有印象的事，我几乎都想知道，但却无法回想起来。

在那幅肖像画的所有色调明快的部分中，我的眼睛最为惹人注目。乌黑的双眸睁得滚圆，惊讶地凝视着前方，似乎毫无目的，但却充满疑问的神情。我每从肖像前走过，总是不由得同自己儿时那双眼睛对视，可是，却从未能回想起画家画这幅画的全部经过。我只记得那里有条铁楼梯，楼梯两侧的墙黑漆漆的，我们拾级而上，到那位画师的画室时，脚步引起阵阵空洞的回声。我努力回忆过许多次，但走上楼梯后发生的事情却总也想不起来。

“伊丽莎白，你在听爸爸讲话吗？”

“听着呢，妈妈。”

“不，你根本没有听，你又在那儿走神了。”

我回头看看父亲，他正停下来等着。

“不久我将宣布这项决定，”他接着说，“但我想还是先告诉你们几个孩子才合适。”

“妈妈已经知道了吗？”布赖恩随口问道。他正用手比比划划，作成一支枪，向靠墙桌上的一个水晶玻璃花瓶瞄准。

“那还用说，妈妈当然知道。”我告诉他。

妈妈知道爸爸的决定是什么，我也知道。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很容易看出事情正在临近——讲演、报刊上的大字标题、家里进进出出的陌生人，但是早在那以前我对此竟就毫无觉察吗？作为儿童，我对它已有所认识，同时因为不知究竟而有些恐惧，并已经感觉到那股注定要彻底排斥我们的力量。

“我充分考虑过了，”他继续说，“而且已经决定参加州长

竞选。”

布赖恩把脸转向他们，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问道，“我不得不转学吗？”腔调中丝毫无意掩饰他的不快。“我们不得不住到萨克拉门托去吗？”

“我们要达到目的，就得通过那座桥。”母亲说。

我同父母不一样，我宁愿对尽可能多的桥——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先行侦察，然后据此制订前进路线。我坐在那里出神地凝视着那块东方地毯上的花纹，完全沉浸在它那无尽的迷梦之中。

“有什么要问的吗？”妈妈说，“你不说什么吗？”

我抬头看看父亲：“爸爸，是什么使你做出这项决定的呢？”

“是这样，贝思，”他把脸转过来对我说道，“你是个聪明姑娘。你已经看到最近几年来这里发生的事情。许多人期待着我，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善良的人。你不想要我使他们失望，对吗？”

“是的，爸爸。但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要呢？为什么他们比我们还重要呢？为什么不能……”

“伊丽莎白！”母亲打断了我的抱怨，“这是你爸爸一生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对他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你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有人甚至认为，他有朝一日会成为总统哩。”

“总统！”布赖恩脱口叫起来，“那时我将到哪儿去上学呢？是白宫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华盛顿那地方或许一个孩子也没有。”

“过来，布赖恩，”我说，“那并不重要。”

“那么你要说的是什么呢？”父亲耐心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是要告诉他我不想让他去当州长吗？还是要他彻底放弃与母亲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那种生活呢？

我想起布赖恩房间里的那个橱柜，孩提时我们常常藏在里面。柜门一打开，里面的灯就亮了，关上后又自动熄灭。那里是我呆过的最黑的地方，现在我就想钻进去，遗憾的是，我已经十六岁了，那个橱柜根本藏不下我了。

“好，我的话说完了，”父亲说道，“衷心希望我没有破坏大家的正常生活。”

布赖恩又回去看电视了。我走出房门来到游泳池旁，路灯映在水面上，象黑丝绒上镶嵌着一颗颗钻石，闪闪发亮。我是从德文回家来度假的。德文是位于亚利桑那州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那里的夜晚漆黑一团，看不到一点灯光，只有笼罩在黑暗中的茫茫沙漠，阵风吹袭着平坦的地面，风滚草球连蹦带跳地从仙人掌杈中掠过。

我不知道到那里之后我的生活是否会发生变化，也不知道父亲一旦成为州长，人们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对待我。对于他是否会在竞选中获胜，我却毫不怀疑，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了。

八岁那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吃饭时的谈话一股脑地转向了政治。当时，我的父亲罗伯特·坎菲尔德是全国汽车公司在电台和电视台的发言人。我想，假如他们的话题是关于汽车什么的，我反而会更有兴趣，因为那毕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个八岁孩童能够理解的东西。然而，家里吃饭时谈的却全是观点、哲学、解释，嘴里都是诸如“授权”、“自由主义者”之类的词，要么就是关于艾克、尼克松、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的讲话什么的。人们思索的也是竞选、支持者、选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等问题。我不在乎哪种方式，而是希望这一切统统从地球上消失。对于我来说，政治不过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和不理解的词汇而已。远处传来阵阵隆隆的雷声——警告我脚下的大地随时可能发生变故。这种变故在我的家中已经成为危险的现实。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以至闯入我们的生活之中，连睡觉的时候也躲不开。它蜷缩在餐桌下面，伺机一口吞掉我在世界上的一切希望。

有时，几家电视台一连几天统统被政治事件所断垄，我喜爱的节目一个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哀叹说：“电视里什么也没有。”在我的心中，世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象《墓地》

那么重要。一天，父亲对我们说：“如果有空袭警报，我就让所有的人都跑进化妆室去，因为那里一扇窗子都没有。”爸爸他们的化妆室十分宽敞，四周墙上全镶着镜子，人一走进去立即就会变成无数个。他的警告我不全放在心上，但一想到要一连几个小时呆在一间小房子里，四面都是自己的影子，就直发怵。几年以后我想到，用他们的化妆室作为防空洞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等不到原子辐射，镜子的碎片就会置我们于死地。

尽管我搞不清谁是我的克星而无法实行报复，但我不打算消极地等待，也无意妥协。凡涉及政治，我不想听，当然也不想谈。只要谈话一转向政治问题，我就突然故意地极其专心地盯着盘子，也不管盘子里是什么东西。要么一连几分钟津津有味地品尝奶油胡萝卜，要么一心想埋头于对付粘在烤羊肉片上的一小块薄荷果子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杯底残留的牛奶可可，就象嬉皮士在数茶水中的茶叶片；我一五一十地数完豌豆，接着又计算珍珠葱头的数目。与此同时，我耳边响的则全是俄国人啦，东海岸的参议员啦的谈话，噼噼喳喳，没完没了。他们时不时地停下来问我在想什么，“我吗？噢，真对不起，我根本没听你们谈话。”我确实没有撒谎。

有时我就避开，他们继续喋喋不休地在那里谈。有时候我的运气也不那么好，父亲向我阐释他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要点，然后询问我的意见。由于尽力集中注意力吃饭已经把我搞得筋疲力竭，所以我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回答他。我常用的方法是说：“不知道。”但不幸的是，这种回答很不成功。我不知道我倒霉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我这个人看上去象是必定有某种观点。有些人看上去硬是不象说“不知道”的那类人。最后一着是简单地随声附和某种可能比较流行的观点——确定这种观点并不困难，因为我父

母经常表现出他们是一条统一的战线。不过，这种回答也不是总能奏效。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我看上去不象是乐于同意他们的观点的那类人吧。我暗自打定主意，要留意看一些比较老的西部片，研究一下那类毫无面部表情的家伙——并培养那种能力。

最后，也是由于一定程度上的绝望，我开始运用一种新的策略，那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故意从椅子上摔下来。我的这一着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仅仅是暂时的，我回到椅子上坐好之后，他们的谈话又重新转回到了政治。我的办法是接二连三地从椅子上往下摔。一顿饭的时间里，我竟一连摔下去六、七次之多。暂且不说我因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地板和椅子间爬来爬去而总是挨饿，我的父母开始怀疑我有什么大毛病。我发现他们开始一天到晚满腹狐疑地盯着我，显然竭力想搞清楚是否我无论坐哪把椅子都会摔下来，还是单单餐桌旁那一把。小布赖恩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睁大眼睛望着我笑，好象他明确地知道我玩的把戏似的。

家人给我换了一把新椅子，是一把扶手椅，比原来那把沉一些。这下更困难了——因为我还不能假装得那么逼真——但我还是成功地从这把椅子上摔了下来。下面是我设法偷听到的他们压低嗓音的谈话。

一天晚上，当我借口看电视离开餐桌后，妈妈对父亲说：“我非常担心伊丽莎白。”我透过门缝，看到他正探过身去对父亲说着，一副神秘的样子。“她好象有什么病，不能坐在椅子上。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病，我们或许应该去找哈里森医生。”

学校的老师们开始研究起我来，似乎我是出现在教室里的一只沙鼠。我猜想母亲已经给学校打了电话，问她的女儿是否有什么反常表现，例如无缘无故从椅子上摔下来什么的。

我被带到哈里森医生那里作了一次检查。他搞乱我的头发，捏了我的双颊，然后开始用冰冷的听诊器在我胸部听来听去。当他把体温表塞进我嘴里的时候，我害怕起来，担心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倘若他们断定我得了某种罕见病，给我胡乱治疗起来可怎么办呢？打针……难吃的药……甚至可能要动手术！截肢！我记得祖父曾给我讲过他家乡温内特卡的一个人的事，那人得了一种叫水肿的病，我怀疑得那种病的人也有从什么地方——诸如从椅子上摔下来的症状。我不知道对水肿病是怎样治疗的，而且我也不想搞清楚。

我打定主意要收场。于是，吃饭时我一直若无其事地坐在桌旁，似乎要否定以前发生的所有怪事。不久后，那把扶手椅被搬走了，又换上了原来那把椅子。

我的父亲面孔英俊，脸皮厚，能说会道，他为全国汽车公司推销了不少汽车，也因此获得了巨额报酬。五十年代末期，全国汽车公司卷入了一件有些令人难堪且又被大肆宣扬的丑闻之中，这件丑闻同一种不成功的核动力拖拉机牵引车有关。全国汽车公司在这项工程中投资数百万美万。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电视的当地新闻节目里看到了父亲，他正从一家餐馆里出来，身后追随着一群记者。

“坎菲尔德先生，全国汽车公司真的要因为这件事而受到挫折吗？”

“我看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父亲眨眨眼睛说。

“说牵引车有辐射泄漏问题纯属造谣。”父亲向他们挥了挥手，高喊着踏进汽车。“真理都是针对荒诞无稽的谣言而言的，他们不是使用盖革计算器追查了吗？”

当我们一起外出的时候，人们听得出他的声音——在街上，

陌生人认识他的面孔。那些要人们终于发现，我父亲招人喜爱的朴实气质远比最新式的样品车更有价值，更受人们的欢迎。这以后不久，父亲开始发表演说，正如我早就傻担心的那样，政治闯入并统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父亲开始同一群群看上去象银行家一样的人在书房里举行会议，接踵而来的是请客、招待。

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你从哪儿冒出一个请他们吃饭的主意？我根本没想过这事。”母亲说：“鲍勃，如果你想有所发展，你就非得这么干。”周复一周，人们来到家里，吸雪茄、香烟、烟斗，喝苏格兰威士忌，谈话、谈话，没完没了的谈话。来人中有些是参议员，也有人介绍时只说是“某某先生”。家人教我同他们握手、问好。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来干什么，只知道他们在谈论政治问题。他们的妻子身着裘皮大衣，珠光宝气。我问一位高个子的金发夫人，她戴的戒指是否是真货色，她低头看了看我说：“当然是真的，宝贝儿。”母亲当即把我轰到另一间房里去了。

“这些人为什么总是非得来这里呢？”

“他们是重要人物，伊丽莎白，他们能帮你父亲的大忙。”

“帮他做什么呢？”

“别管这些，亲爱的。你上楼同布赖恩玩去吧。”

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善于辞令，在跻身政界的社会名流中如鱼得水，不久就成为收入颇丰的共和党发言人。他的口才以前一直不错。还在全国汽车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曾到我校的大会上去讲演过一次，讲的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为人民提供了那么美观、新颖、安全的交通工具，我们都应该如何自豪云云。我记得当时我为他深感骄傲，同时又有些担忧，因为不管使他出众的原因是什么，我却永远不能使他属于我一个人了。

别人听我父亲讲话，我父亲听他岳父讲话，而我却常常因为谁的话也不听而受到训斥。外公塞缪尔告诉我，妈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如何如何，我应该象她那样才对。“哈丽雅特小时候从不顶嘴，做礼拜也不调皮。”

塞缪尔外公一眼就能看出谁心神不定，谁专心听讲。他是第一长老会的传道士。每逢星期天，家人给我穿上一件浆洗干净的玻璃纱长裙，领我上教堂。父母坐在我的两边。塞缪尔外公洪亮的声音在我们上方回荡，我盯着太阳慢慢从肮脏的窗格玻璃上爬过……烦躁得坐立不安。

礼拜结束后，我们通常到外公家吃午饭。外祖母在我出世前就去世了，但却从挂在墙上和放在书架上的画像中凝视着我们。她穿着带花边的高领罩衫，黑色的丝绒一直挨着下颏，我甚至怀疑她的过世是不是因为领子太紧的缘故。画像旁边摆着装糖果的盘子，里面总是满满当当的。当塞缪尔外公告诉父亲怎样“控制听众——你必须懂得怎样抓住他们”时，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抠巧克力糖，看看我是不是喜欢里面的馅儿。

一天，巧克力糖吃完了，只剩下对牙齿有害而且含在嘴里不易溶化的水果糖。不得已，我只好坐在长沙发椅上，尽量作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听塞缪尔外公教父亲怎样向公众演讲。

“你知道，罗伯特，流行词语，也就是引起人们注意的词，象自由啦，道德啦，责任啦，家庭啦，都属于这一类。你必须懂得怎样用你的声音强调这些词——加大嗓门，提高声调——当然，孩子，一定不要妨碍引用《圣经》支持你的观点。好好地利用全能的上帝赐给你的所有工具吧。”

几年后，我坐在听众席上听父亲为一位总统候选人作竞选演说。他以圆润有力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谈论自由、作出符合道义的